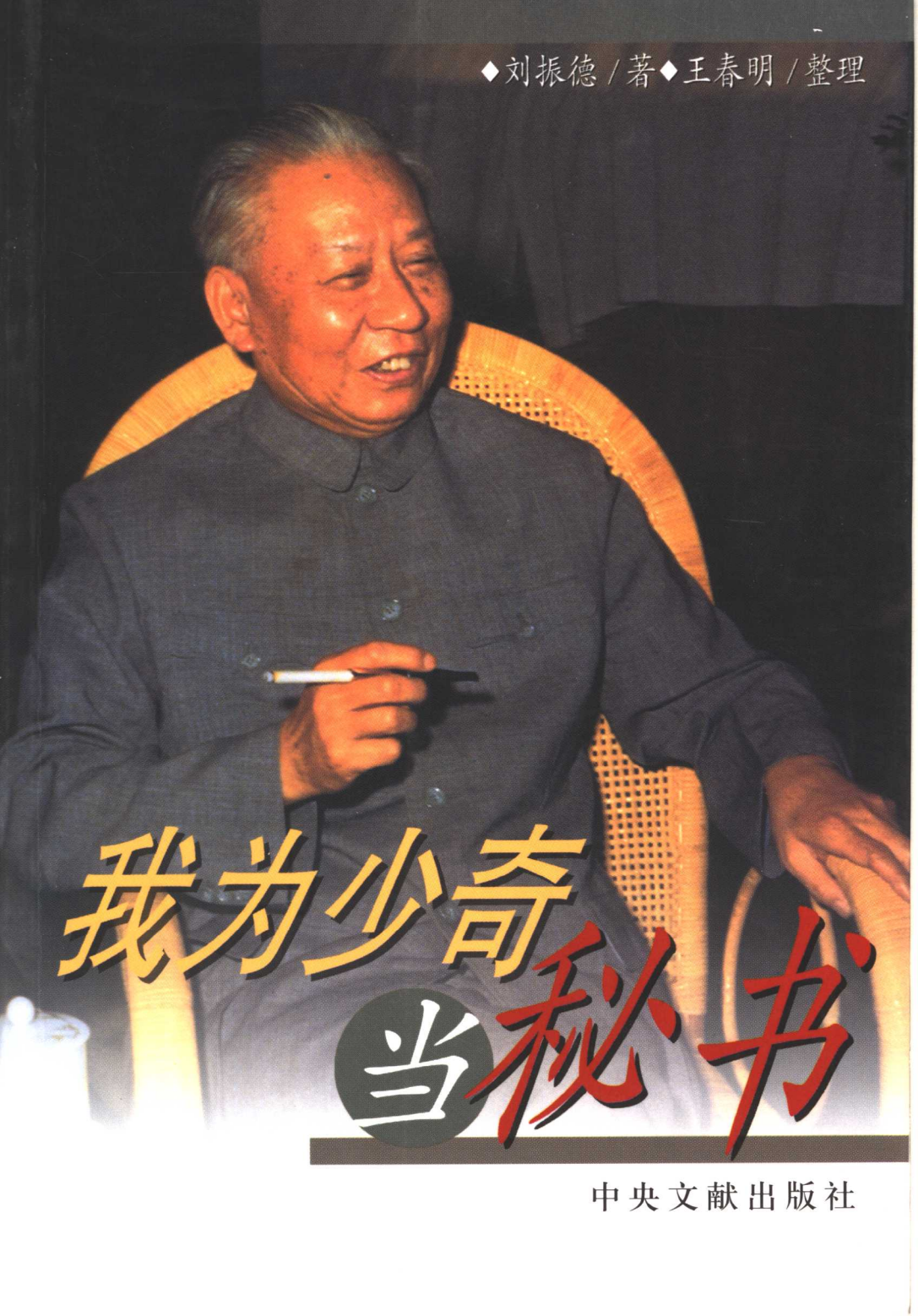


◆刘振德 / 著◆王春明 / 整理



我为少奇 当秘书

中央文献出版社

我为少奇当秘书

刘振德著 王春明整理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为少奇当秘书:增订本/刘振德著. —2版.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11
ISBN 7-5073-1353-0

I. 我… II. 刘… III. 刘少奇(1898~1969) -
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1112 号

我为少奇当秘书(增订本)

著 者/刘振德

整 理/王春明

责任编辑/王春明

封面设计/张 戈

版式设计/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1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人卫印刷厂

印 刷/北京人卫印刷厂

880×1230mm 32 开 13.75 印张 300 千字

2003 年 11 月第 2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ISBN 7-5073-1353-0/K·600 定价:28.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序

刘振德同志自1956年至1967年间担任少奇同志的机要秘书。我们一起共事11年。与他合作，使我受益匪浅。

振德同志出身很苦，小时候只“半工半读”的上过两年小学。作为儿童团团长，他1940年正式参军时才14岁，第二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红小鬼”；解放战争期间，他在第二野战军秦基伟将军的十五军军部担任译电员工作。1950年调入外交部后，在我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任机要组组长兼译电员。在此期间，他还学会了保文和俄文。1953年，他被调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工作。

由于长期担任译电工作，使他工作严谨、认真，记忆力很强。艰苦的不规律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还使他很能吃苦耐劳。他的出身和经历使他逐渐具备了热爱党和革命事业的优良品质。他严于律己，热心帮助别人，曾被选为我们二组的支部书记。

近些年来，振德同志在年逾六旬，并患多种疾病的情况下，坚持不懈地写出了他的回忆录，反映了他对少奇同志始终不渝的真挚感情，值得敬佩！



我为少奇当秘书

序

我刚刚读完这本回忆录的草稿。振德同志在书中用大量篇幅写了在少奇同志身边工作时的事情，只有极少数几件事是我以前不知道的，其余均是真实而未加修饰的。这是一本难得的党史资料参考书。

我热情地祝贺振德同志的这本回忆录出版！书中有些对我的鼓励话，因系他个人的看法，我不便改动。

但愿读者能从这本书中更多地了解少奇同志；但愿像“文化大革命”的事，再不要发生。这是大家的共同心愿！

1993年7月29日晨



目 录

我进中南海	(1)
向少奇同志报到	(9)
“一个字就换了一个人”	(21)
“一定要绝对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	(31)
党的八大召开前后	(38)
“你们大约需要多少粮食”	(44)
“一切为了美好的明天”	(50)
“这不是反革命事件”	(56)
视察建设中的武汉长江大桥	(62)
干部“绝不能搞特殊化”	(66)
鼓励青年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72)
“凡事都要依靠人民群众”	(78)
“弹簧不能拉得太长了”	(82)
“劳动万岁”	(86)
“我也入你们的社”	(92)
“亩产 5000 斤,肯定是吹牛”	(96)
“这才是真正的一害”	(100)
“神仙”们并不都逍遥	(104)
“我不知道”	(112)
同彭老总、张闻天谈话	(115)
不平凡的家庭会议	(118)



海南岛养病	(123)
“我同意振德同志当支部书记”	(130)
“劳动真是其乐无穷”	(134)
“把客轮横在江心”	(141)
刘桂阳案件始末	(147)
“下榻”猪场饲料库	(150)
煤油灯下的座谈会	(155)
韶山改字	(160)
“困难最怕爱动脑子的人”	(164)
“对不起各位父老乡亲”	(169)
“食堂不解散不得人心”	(177)
“我也有责任”	(185)
“要对每个公民的政治生命负责”	(192)
“这就好,这就好嘛”	(197)
“只通知我要去的地方”	(201)
“下大雨我也要上山”	(205)
“要后继有林”	(211)
“伐木工人的酒不能取消”	(215)
制定政策要因地制宜	(217)
“要惜木如金”	(221)
牧民、工人、学生	(223)
“要什么晚餐费”	(229)
他只说了三个字	(235)
参加支部整风会	(238)
从自己做起,取信于民	(241)
俭朴不是丑事	(245)



“我睡地铺不就解决了”	(251)
只有 23.80 元的钱柜	(254)
“我完全支持你”	(258)
“任何人不能对外说我病了”	(261)
战友情深	(264)
“我们的国家一定能早日强盛起来”	(268)
慈父严师	(272)
叫我讲家史	(279)
生日贺信	(283)
对孩子们的“管”和“放”	(287)
在社会实践中学习	(290)
允若和我一起搞“四清”	(295)
“毛毛在那里怎么样”	(306)
“祖国和人民等待着你的归来”	(310)
“我还接不上头”	(314)
紧急选派工作组	(320)
毛泽东批评派遣工作组	(326)
林彪定调	(331)
解答工作人员的提问	(337)
董洁如被赶出中南海	(344)
康生与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	(351)
一封匿名信	(362)
宋庆龄赠书	(365)
江青造谣	(369)
造反派的骗局	(373)
“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的主任”	(378)



我为少奇当秘书

目录

“我向毛主席提出两点要求”	(382)
“我永远不反毛主席”	(386)
“不要把我当成敌人”	(391)
“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	(400)
造反派的疯狂进攻	(405)
“洋奴哲学”的真相	(409)
国家主席被抄家、软禁	(413)
离开少奇同志以后	(420)
后记	(430)



我进中南海

1953年，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这年的6月，我有幸被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从此时起，直到1967年6月，我就在新中国的政治中心、全国人民所景仰的党中央的所在地——中南海，整整工作、学习和生活了14年。

中南海，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神圣而神秘的地方。我刚调来时，尤其是机要室的领导向我介绍了机要室的工作性质和服务对象后，更增加了我心目中的这种神圣感和神秘感：

“中办机要室是掌管我们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地方。在这里每天24小时，要收发、处理和运转成百上千个来自祖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文件、电报和信件。所以，它是个承上启下、沟通信息的枢纽，是最高机密的汇集处。

“机要室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重点是政治局常委。机要室的主任叶子龙就是毛主席的秘书，副主任康一民、吴振英、潘开文分别是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秘书，秘书科科长邱兰标曾是杨尚昆主任的秘书。还有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秘书也是从机要室派去的……”

这里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和兴奋。但我却无心欣赏那美丽的奇花异草、那精美的亭台楼阁。当时，除了工作，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想尽快见到我所崇敬的中央领导同



志。在我调来之前就听说过，我们党的领袖们都住在中南海里。可是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何时能够见到？近在咫尺，却难睹风采，我那热切盼望的焦急之情真是无法形容。

北京的夏天是令人难熬的。一天晚饭后，天气很闷热，我们无处可去。邱兰标对我说：“咱们到楼顶上乘乘凉吧。”我当然很高兴，回答说：“调来以后，还不知道可以上楼顶呢。”我跟他上去后，顿时感到心旷神怡。习习的晚风迎面吹来，夕阳的余辉给美丽的京城涂上了一层金黄色。我们居高临下放眼四周：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宽阔平坦的天安门广场，松柏簇拥着的景山三式五个亭，洁白如玉的北海白塔……尽收眼底；环顾中南海，更是叫我目不暇接。郁郁葱葱的绿树丛中散落着七高八低的平房、古朴典雅的四合院，还有那湛蓝的波光粼粼的湖水、那曲径通幽的假山、小道……

我被眼前这美丽的景色所陶醉。突然，脑海里闪现出一个早就想知道而不敢问的问题，能不能借机向邱兰标同志打听一下中央领导人的住处在什么地方？尽管，我知道纪律是不允许打听这些的，但在那种情况下，我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迫不及待地脱口而出：“请你告诉我周围这些房子都是什么人住的？干什么用的？”邱兰标看了我一眼，似乎理解我的心情，便用手指着那一幢幢建筑，一一向我介绍说：

“南面那幢小楼叫甲楼，是刘少奇副主席居住和办公的地方；西面那幢小楼叫乙楼，是朱总司令居住和办公的地方；中间那幢小楼叫丙楼，是杨尚昆主任办公的地方；我们这幢办公楼叫丁楼，在中南海里算是最大的建筑了，1950



年才建成的。”

他转身指向北面，说：“那幢建筑就是怀仁堂，里面可以开会，也可以演节目，实际上就是中央的礼堂。怀仁堂后面那个院子叫福禄居，是林老（林伯渠）住的地方；东面的那幢叫庆云堂，是董老（董必武）住的地方；南面的那幢叫永福堂，是彭老总（彭德怀）住的地方；永福堂左前方那幢大房子叫春藕斋，可以放映电影，也可以举办舞会。”

说到这里，他停了停，加重语气继续说：“你看那幢院子，就是春藕斋东面的那幢，那是毛主席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它叫丰泽园；再往东是勤政殿，是毛主席接见宾客的地方；西面的那幢叫颐年堂，是毛主席召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开会的地方……”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接着神情严肃地嘱咐我：“刚才给你说的这些领导人的住处，必须保守秘密，是绝对不能对外讲的。本来，我不该给你说这些，但因为你在机要室工作，知道一些也有好处。”我点头向他表示：“一定保密。”

这时，我突然想起，他刚才没有提起周恩来总理的住处，又问他：“周总理是不是不住在中南海？”“呵，周总理也住在中南海，不过，离这里比较远，我们看不到他的房子。”他回答我后，向北指了指说：“周总理住的地方叫西花厅，离北门很近，就在中南海的西北角上。”

提起周总理，我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景，便对邱兰标说：“1950年，我们出国时，周总理还接见了我们。但是因为我刚从部队调到北京，对这里的地理情况一点也不熟悉，所以至今也没搞清楚，总理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接见的我



们。”邱兰标听到这些，半信半疑地对我说：“周总理是怎么接见你们的，说说看。”

“那是1950年的夏天，我从部队被调到了外交部。当时，苏联及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我们刚刚成立的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除苏联外，其他国家，我们还没有派外交人员去。这时，外交部配备了以曹祥仁大使为首的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并集中到前门外煤市街一个旅馆进行培训。一天上午，外交部突然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套灰色卡叽布制服，叫我们马上把身上穿的破旧军装换下来，说下午要去开会。

“下午两点钟，我们十多人坐在汽车上，拐弯抹角，走了很长时间，穿过一条林荫大道，开进一座有哨兵站岗的大门后，在一个小花园旁下了车。然后，在曾给我们讲过外交知识课的王炳南（听说他当时是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带领下，我们登上几个台阶，来到一个会客室里。大家坐下后，他才说，‘今天，周总理（当时还兼外交部长——作者注）要见见大家，请稍等一下。’

“一听说周总理要接见我们，大家都紧张起来了。除曹大使在延安见过敬爱的周总理外，我们这些从基层来的同志谁都没有见过，如今梦想中的事情马上就要变成现实了，大家怎能不紧张、不激动呢？大家静静地盯着周总理将要进来的门口。

“不一会儿，周总理在外交部李克农副部长的陪同下，健步来到了会客室。大家起立，总理微笑着同大家一一握手，并认真地询问了每个人的姓名、年龄，从哪里来的，原来做什么工作。我和另外两位同志回答都是译电员时，总理



和气地说：‘去三个多了，我看去两个就可以了，那里的事情不会很多。’李克农马上说：‘同意总理的意见。’当总理问到武官夫人的姓名时，那位夫人回答‘叫司明’，总理问明白是哪两个字后，笑着说：‘这不是你原来的名字吧？’夫人答：‘是做地下工作时用的名字。’‘噢，那你现在可以改过来了。’总理还是那样亲切地微笑着。

“我们坐下后，总理开始讲话。他说：‘你们要去的保加利亚是季米特洛夫的祖国。季米特洛夫是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他在世时，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对中国共产党比较了解，对毛主席也很尊重。’我们个个听得入神。这时，总理以轻松的语气说：‘季米特洛夫吃辣椒赛过毛主席呵。’

“总理继续说：‘你们去了以后，首先要学习保加利亚文，学好驻在国的语言，工作起来既方便，又会使人感到亲切。’

“总理问曹大使：‘去的译员是不是学俄语的？’曹大使说：‘一个俄文翻译为主，还有个随员懂英语。’‘这就好。’总理说：‘保加利亚是苏联红军解放的，他们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你们要注意到这一点。’总理又问：‘保加利亚有什么特产？’曹大使答：‘据说，除了葡萄、苹果，还产玫瑰油（一种高级香精）。’总理笑着说：‘那你们用吧，我们是用不上了。’

“这时，总理看了一眼在场的几位女同志，关心地说：‘我们的女同志到了大使馆后，要安排适当的工作，可不能只当夫人，那样你们也不会安心的。’

“总理又问过李克农保加利亚的人口后说：‘不论大国小



国，各有长处，要向人家学习，把关系搞好。……凡事开头难，你们是我国派出去的第一批驻外工作人员，以后还会有很多国家将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我们还会有许多同志到外国去工作……’

“说完后，总理首先站起来，又和大家亲切握手告别。”

我讲完之后，邱兰标说：“那可能总理就是在西花厅接见的你们。”

这时，我更感到兴奋。心想，原来，全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领袖们就住在我们办公楼的周围，我能同他们共同工作中南海里是多么幸福和自豪啊。

我趁机又问邱兰标：“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见到他们？”他说：“你不要性急。机会当然有。我们担负着中央的会务工作，他们来开会就能看得到。”他又指着紧挨机要室大楼东头的平房说：“那儿叫西楼大厅，就是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

他笑着问我：“你会跳舞吗？会跳舞的也可以在春藕斋和紫光阁的舞会上见到几位领袖。毛、刘、周、朱都会跳舞，每周六都有舞会；朱总司令爱运动，如果留心注意一下，你每天都可以见到他。每天三顿饭他都要步行 100 多米到食堂去吃，而且都要从我们这个楼的后面经过。他还经常在食堂门口做做操。星期天还常到中海去划船，到花窖去赏花，朱老总爱养花，而且最爱养兰花。他年纪大了，生活比其他领导人有规律。”

他又指着西楼大厅说：“那儿北头有个小食堂，是刘副主席、朱总司令、彭老总和杨主任就餐的地方。”

……



在结束这次谈话时，他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要绝对保密！”

我逐渐适应和熟悉了机要室的工作和环境。红墙内的神秘感也逐渐在消失。而那种无以名状的神圣感和责任感却在与日俱增。

在我们机要室里，不论是领导，还是一般干部，大都是老红军、老党员、老机要员。就连秘书科的正副科长都是1930年前后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他们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着，当时被誉为“无名英雄”。有个别同志调来后，觉得和原来想像的大不一样。原来认为革命胜利了，进了中央机关，到了中央领导身边，一切都会很舒适、很方便、很轻松，根本没有想到这里比基层的工作更紧张更繁忙，要求更严格，生活更俭朴。所以有些同志适应不了。特别是那些计较名利地位的同志，到这里来，更是无法安心工作的。

在我们每间办公室的墙上，都悬挂着毛主席那苍劲有力的草书题词“艰苦朴素”四个大字。我们不但把领袖的教导挂在墙上，更落实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的副科长、老红军赖奎同志在工作分工上就有管勤俭节约一项。我上班后，他就对我说：“夜间办公，开台灯时，就不要开吊灯；开吊灯时，就不要开台灯；第一次剪开的信封，不要扔掉，还要准备用第二次、第三次……总之，一切办公用品和费用都要厉行节约，精打细算。”他还经常翻一翻废纸篓，看看有无浪费现象，如有，他就不厌其烦地唠叨几句，然后再把别人扔掉的东西拣出来。他经常挂在嘴边的总是毛主席的那句话“节约每一个铜板，为了支援前线”。有老红军的言传身教，



勤俭节约也就变成了我自觉的行动。

我们的科长、老红军邱兰标同志主管业务。他抓保密、抓纪律，样样一丝不苟。他要求我们“上班不迟到、下班不早退，办公室要保持肃静，工作时要聚精会神、专心致志，不交谈、不议论，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总之，浑身是机密，处处有纪律。工作之余也没有什么文娱活动。

虽然，我们工作很紧张，生活很单调，但我们的心情是愉快的，精神是饱满的。因为这里聚集着许多党叫干啥就干啥、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的组织性、纪律性都很强的优秀共产党员；因为这里不论是上下级，也不论是新老同志，都能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特别是那些饱经风霜的老同志，他们那种不居功、不自傲、不为名、不为利，对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对工作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奉献精神，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新的一代。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尽最大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中央领导服好务！